

# 软权力与中国的文化安全探析

■ 蒋旭东

[摘要] 文化安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软权力概念的出现为我们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并制定文化安全战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用软权力战略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战略发挥着愈来愈巨大的作用,对中国的文化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为了迎接挑战,必须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借鉴他国经验,建立防范机制,实行文化适度准入;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抵制和粉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关键词] 软权力;中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0)05-0088-04

本文拟从分析“软权力”理论出发,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形势及战略做一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

到底何为软权力?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前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和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区分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的主张。这里,硬权力是指靠经济和军事实力支配的力量,采用的是指示式或命令式的实力运用方法。在他看来,这种“命令式的实力运用主要靠诱惑(胡萝卜)和威胁(大棒)”,“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的某国产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这种间接的实力运用方式,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表现,它的特点是“使人随我所欲”,“这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左右他人的意愿的努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软力量,它与军事和

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对照”。<sup>[1]</sup>在他看来,软力量作为一种“同化行为的能力”、“即让人随我欲”的能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构准则和制度”。<sup>[2]</sup>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奈在随后和基欧汉写的《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存》一文中把信息力作为软力量十分重要的成份加入到了软力量的概念中。奈认为,知识和信息是信息时代力量的重要源泉,知识就是权力。一个领导着世界信息革命的国家注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sup>[3]</sup>

软权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有缓和倾向,生态失衡、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等许多全球问题已经出现并越来越严峻,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强;私人的跨国集团力量的增强,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国家利益复杂化。于是,在国际关系中,硬性力量日益分散,力量行为的强制性在降低。经济威胁、军事讹诈等强制性行为的代价变得十分昂贵。所以力量资源中,威胁性越小的部分,将变得更有实用价值。而软权力,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影响力等无形的力量则是“无需投入过多并且有相当价值的软权力资

源”<sup>[4]</sup>。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各国的文化意识日益复苏,“软权力”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安全问题开始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

那么,何谓文化安全?据笔者所见,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作法,防范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背景下,之所以把文化安全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重视,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对国家有深刻的无形的影响,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是独特的,是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不可替代的。不仅如此,文化安全还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精神动力,为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提供深厚的道德基础。否则,一个在文化发展上缺乏贡献能力和创新精神,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民族,它在政治上一般也处于依附和追随地位。这已是为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

当前,软权力的较量正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文化博弈。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强势地位,它不仅积累起了庞大的物质力量,保持着强大的硬权力资源,而且还以此为后盾,借助其特殊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庞大的传媒体系和信息革命的有力推动,构造起强有力的精神或文化力量,开拓出雄厚的软权力资源。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甚至认为,美国的软权力“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强大。美国的文化,不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但更具有新奇性……美国的软权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sup>[5]</sup>美国是最善于利用软权力战略达到自己目的国家,它在进行全球经济推进的同时,也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来传播美式民主、价值观。克林顿政府曾提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

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的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迫切必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可靠战略方式”。要不惜一切代价,“使走向民主的国家得到鼓励,使拒绝民主的国家付出代价”。<sup>[6]</sup>布什政府更是将推行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作为一大根本国策,并写入了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这种软权力战略既为美国推行霸权、干涉别国内政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也为美国带来了更具影响力的手段和最大化利益。

美国“软权力”对中国的挑战尤其尖锐。美国在新世纪要维持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谋求稳固的世界主导地位,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战者的出现。冷战结束后,这个潜在的和现实的挑战者就是中国。苏联一经解体,美国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即中国。遏制中国也就成了美国的国际目标。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使用软权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方面是用尽了心思。他们知道,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所以就要从这里入手。以美国为大本营的西方强大的跨国媒体控制着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在这个国际传播体系内制造和流通的新闻和娱乐产品竭力弘扬西方的制度、组织机构和主流价值观,并使其合法化。而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信息、思想、体制、组织和个人在这个媒体传播体系内几乎得不到传播或正面报道。他们制造中国威胁论,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形势,遏制中国发展;宣扬人权高于主权论,对中国的人权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提出历史终结论,叫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抛出文明冲突论,宣扬未来世界的冲突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号召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称之为封闭的、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等,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灌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色情暴力等腐朽思想文化。所有这一切,目标只有一个: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搞乱我们的思想。

这种文化渗透的效果绝不亚于针对我国的一场战争。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也进一步加大。根据我国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条款,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允许引进比例不超过49%的外资建造改造影剧院,允许建立中外合资的录音录像发行企业。外国公司可投资中国因特网业,投资比例在入世后的3年之内逐步达到50%,并不受地域限制。我国允许每年以分账制进口20部电影。这些规定使得我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的难度加大,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变得更为便捷。中西软权力的较量、舆论阵地的攻防更趋激烈和复杂。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突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减少不良文化信息的负面作用,维护文化安全,将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新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竞争甚至对抗是客观存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质决定了它们不会让社会主义顺顺利利地发展,决定了它们不会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早在1989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就曾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呼吁:“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可能要用二三十年时间,届时将有可能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sup>[7]</sup>这一呼吁,可以看作新世纪资本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的一个总的战略目标,也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采取新的“软实力”攻势的总动员令。

### 三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正面临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更多来自资本主义“软实力”的冲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众多,但是,西方软实力战略围攻下主动提出指导思想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其制度倾覆的重要原因。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在当前形势下,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充分开发和运用软实力资源,坚持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抵制和粉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我们实施文化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提供了根本准则。在当代中国,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干扰,抵制和粉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首要任务在于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引导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向上、共同前进。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sup>[8]</sup>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对充满差异性和多样性思想观念中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分,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有明确的目标取向的。这个目标取向,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最大限度地成为社会思想共识和人民的自觉追求,从而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此,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部位和各个环节,努力推动社会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其次,坚持文化的适度准入,这是我们实施文化安全战略的迫切需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在遭受外患和列强入侵的多次危机中涉险过关,本土文化所培育的民族精神是最坚强的支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中国人民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后逐步形成的坚定信念,社会主义精神已经融入人们的血液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和方向。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迫切需要凝

聚全民族和全体海外同胞之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紧要时刻,本土文化的泯灭、社会主义文化的丧失,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灾难。因此,新世纪新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文化利益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行适度准入。对民族文化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实行适度准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第三,必须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实施文化安全战略的根本措施。当前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挑战中,必须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为思想文化无独立的历史,它的存在和发展始终是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现实政治中看,文化作为软权力地位的上升,并没有使文化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软权力仍然要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权力为依托和后盾,才能发挥出它的能量。亨廷顿指出: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sup>[9]</sup>在今天的国际领域,我们能看到有强大硬权力的国家经常有巨大的软权力,因为强国拥有的强大的硬权力能吸引其他国家,其他国家能认识到追随或顺从这些强国的重要性,以使这些国家的目标能容易实现。历史的经验也一再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展停滞、民不聊生时,最容易出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混乱,更谈不上发挥软权力的作用。正如约瑟夫·奈所说:“作为‘山上之城’的软权力并不能提供软权力所提供的强制性的能力。它并不能独自支持一个非常冒险的外交政策。”<sup>[10]</sup>当今全球性九大商业传媒由发达国家九大巨头把持,号称“第一板块”。如“第一板块”所控制的音乐公司就占有世界音乐市场的90%。全球300家最大媒体,美国144家,欧洲80家,日本49家,发展中国家只有27家。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一年文化产业的销售额还不如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sup>[11]</sup>美国正是利用自己的科技和经济优势,通过建立卫星电视、电台、因特网等多种新闻传播媒介、信息渠

道以及美国电影等娱乐体系,进行文化扩张的。国际社会激烈竞争的事实告诉我们,“硬权力”衍生“软权力”,强国地位最终才能取得在世界主流文化的一席之地,任何企图在经济贫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文化优越性的想法都是天真的。中国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抵御文化入侵、保持民族文化独立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口头说教上,而是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的观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经济,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增强综合国力,创造出生产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为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发挥社会主义文化优越性提供可靠的物质条件。

注释:

- [1][2][4]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25).
- [3]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 Fall 1998: p.81-94.
- [5]Josef Joffe,“Who’s Afraid of Mr. Big?”,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1:p43.
- [6]参见王晓德.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
- [7]转引自:郑杭生.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N].人民日报,1999-06-01(9).
-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1).
- [9]参见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84.
- [10]Joseph S.Nye,Jr.,“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 July /August 1999:25.
- [11]孙慕天.从“至坚”到“至柔”[N].光明日报,2008-07-22.

作者简介:蒋旭东,河南南阳人,高等教育出版社社政出版中心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耿超锋